

## 简论渤海日本外交史学

牡丹江师范学院 张 高

渤海国与日本国在8—10世纪间长达两个世纪之久的外交史是中世纪中、日外交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一个世纪以来,各国(主要是东北亚国家)学者对渤、日外交史十分重视,发表了一批有关渤、日外交史方面的学术论、著。但迄今为止,我们尚难把渤、日外交史系统化,其难点,不仅在于有关文献和文物的不足,也存在渤、日外交史学理论及研究方法论方面的一些问题。本文试图对渤、日外交史学的几个问题进行探讨,愿与有关国家(主要是日本)的渤海史学者商榷。

1、渤、日外交史上限一般认为是727年,实际是720年(日本元正天皇养老4年、渤海武王仁安2年)<sup>①</sup>,下限为926年<sup>②</sup>。从时间上看,渤、日两国间的外交活动几乎贯穿于渤海国历史发展的全过程。耐人寻味的是:渤海王国和新罗王国相邻,又同为唐帝国的属国,却长期对峙;渤海同日本隔海相望,海路多险阻,却长期友好相处。中、外一些史学家例如日本的石井正敏先生等,看到了“渤海在日、唐间的中介作用”<sup>③</sup>等,可以把它作为解释渤、日长期友好的原因之一。渤、日长期友好,从宏观上看,主要是由于8—10世纪东北亚国际政治、经济与国际关系总格局的制约。

80年代末,笔者曾发表《渤海国与东北亚政治》<sup>④</sup>一文,探讨了渤海国时期东北亚政治的总格局等问题。唐代,中国的封建经济、政治和文化是世界东方的中心,在东北亚,不仅在唐帝国版图内的渤海国等中国少数民族地区学习中原地区汉族先进的封建经济、政治和文化,而且,东北亚的新罗,乃至日本亦以唐代中国经济、政治和文化为学习榜样,与唐帝国频繁地进行经济、政治和文化交流。

东北亚政治是一种区域性的国际政治,受东北亚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的限制,东北亚国家、地区之间的交往、战争、结盟等,除唐帝国外,一般未超越东北亚地区的界限。这是研究渤、日外交史的一个重要前提。

东北亚政治的总格局在渤海国时期是一极,即:以唐帝国及五代十国时期的中国为中心。在政治领域内,东北亚国家、地区间的外交主动权基本上操纵在唐帝国手中,唐帝国以外国家的对外政策,基本上是对唐帝国外交政策的反映。以唐帝国为中心,唐、日友好;唐、新友好,等,形成了一个较稳定的东北亚政治总格局。

渤海国在东北亚政治上有着特殊地位,对内,渤海国是唐帝国的属国一国中之国,同时又是国中之州;对外,渤海国具有较大的外交独立性,是一个与日本、新罗平起平坐的国家。

东北亚政治的总格局稳定中有变化,这在渤海国后期表现得十分明显。这个时期,东

北亚政治发生了一些明显的变化,主要是:东北亚政治力量大分化,大组合,唐帝国灭亡,中国开始了五代十国时期;朝鲜半岛出现新的三国分裂局面,高丽逐渐强大;契丹在中国东北地区逐渐成为新的政治权力中心等。

2、严格的说,渤海、日外交历史还构不成近、现代特别是当代意义上的外交史,因此,我们在对渤海、日两国外交史进行研究时就往往遇到一些当代人提出的问题,有些是难题,例如:渤海、日两国的外交政策和原则是什么?如何解释渤海、日这两个封建国家对外政策的开放性?……。

渤海、日外交首先须具备两国交往的客观历史条件,渤海、日两国统治者须有相互交往的主观愿望。一般讲,封建主义国家具有封闭性,而后起的资本主义国家才具有开放性。但具体到渤海和日本,须作具体分析。日本在646年大化改新之后从奴隶制社会进入封建制社会。半个世纪后建立的渤海国家亦迅速地从半奴隶制、半封建制社会向封建制社会转变<sup>①</sup>。到渤海、日两国开始交往的8世纪,渤海和日本均处于封建主义制度上升时期,而处于上升时期的封建制国家的对外政策是比较开放的。

从空间上看,渤海、日两国外交政策均受到唐帝国对外政策的宏观制约:在当时世界上唐帝国是一个开放性国家,其对外政策是同周边国家(有的是附属国,例如新罗等)乃至远方国家广泛交往,和睦相处。在这样的大环境里,渤海国的对日政策与唐朝中央政府基本上保持了一致,奉行睦邻友好政策;坚持“永敦邻好”<sup>②</sup>、“赁礼相交”<sup>③</sup>的外交原则,是顺理成章的。(至于渤海同新罗的关系为什么紧张这个问题,不在本文所讨论的范围之内。)

渤海和日本两国的开放性是一种很有限度的开放性,或者说,是一种封闭中的开放性,这种开放性同近代以来资本主义国家的开放性具有本质不同,即:资本主义国家的开放性建立在商品经济、市场经济的基础之上;封建主义国家封建中的开放性则是建立在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的基础之上。渤海、日两国的经济、文化交流尽管规模比较大,但其目的主要是为了满足渤海、日两国封建统治阶级的部分物质和文化生活的需要,因此,两国之间的经济往来主要是一种官方的易货贸易,而不是近代意义上的商品、货币交换。认识到这一点很重要,它可以使我们对渤海、日外交关系有一个清醒的认识,不至于全盘肯定或全盘否定渤海、日两国的经济、文化交流等。

3、渤海、日两国关系总的看是友好的,是一种平等,互利的关系。个中原因还得从渤海、日两国所处的历史时代、从渤海、日两国的社会经济、政治和文化方面寻找。

除前述渤海、日关系受唐帝国时期东北亚政治、经济和国际关系制约外,还有:渤海、日两国封建制国家均处于封建主义时代的上升时期,在这个时期,新的封建统治者一般勇于变革,较少保守。反映在对外政策方面,一般奉行对外开放、睦邻友好的政策。

其次,渤海、日两个封建国家之间在各方面特别是在经济方面,基本上互不构成竞争,威胁。相反,各自国内封建社会主要是农业经济的发展,不仅不易构成对邻国的军事威胁,反而有利于各自国内政治局面的稳定,采取友好睦邻的对外政策。

再次,渤海、日两国隔日本海相望,日本是个岛国,对海洋的依存性较渤海强。同时,渤海国这个大陆国家亦希图向海洋发展,最明显的是:渤海国曾一度从上京龙泉府迁都距离

日本海很近的东京龙原府；在此之前，渤海国已开辟了“日本道”。这条海上通道缩短了渤、日两国的实际距离。

最后，渤、日外交史是唐及五代十国时期中、日外交史的组成部分。渤海国在唐（中）、日两国间处于重要的中介、桥梁地位，渤海国的这种中介，桥梁地位或作用，仅从渤海国所处的地理位置看是不够的，还要从渤海国是唐帝国的属国、属州（地方民族政权）的角度看，不从这个角度看问题，一些现象就难以理解，例如：渤海国为什么把唐帝国中原地区的《长庆宣明历》传到日本<sup>⑧</sup>？渤海国为什么把日本舞女献唐廷<sup>⑨</sup>？……。

当然，在渤、日外交史上也出现过一些障碍。日本方面在政治、经济、文化上人为设置的障碍曾在某个时期内影响了渤、日友好关系，例如：753年，日本孝谦天皇复书渤海文王大钦茂，指责其“来启无称臣名”<sup>⑩</sup>，就毫无道理。唐帝国属国渤海国王能对日本天皇称臣吗？

再例如：日本方面曾有过严加限制渤海与日本间的私人贸易的禁令。王承礼先生认为：日本方面之所以在渤、日外交后期与渤海交往“不积极”，主要原因是“随着日本经济的衰落，日本在9—10世纪对外采取锁国政策”所致<sup>⑪</sup>。

我们注意到：日本方面在渤、日关系方面所设置的障碍，反映出日本封建统治者狭隘的小生产思想意识，而日本的平民百姓，包括官僚中的有识之士，对渤、日关系都十分珍惜，这是渤、日两国得以长期友好的基础。例如：渤、日两国官员中的文人间的长期友好交往，“自杨泰师、王孝廉、王文矩、杨承规等以文采见重异域，而裴氏父子尤为特出”<sup>⑫</sup>。

对渤、日外交史宜实事求是，切不可以一种倾向掩盖另一种倾向，不可说渤、日关系好就什么都好，不说渤、日两国间的矛盾和分歧。反之，亦然。

4、若用当代国际关系史的理论观察渤、日关系，一些问题就难以说明，诸如：渤海既是唐帝国的属国和州，是个地方民族政权，有什么权利与日本发展平等的外交关系？……。

必须把眼光放到8—10世纪的东北亚去观察问题。当时，在东北亚、在世界东方，有一个强大的唐帝国，许多国家特别是唐的周边国家，例如日本，学习唐代中国先进的经济、文化和政治，由于交通条件等的限制，唐帝国在边疆地区的一些属国例如渤海国，自然地成为中、日外交的中介、桥梁。

还有，渤海国之所以在8—10世纪中，日外交史上起中介，桥梁作用，与它具有属国、属州的二重性有关。渤海和新罗“两国都接受了唐的册封”<sup>⑬</sup>，同为唐之属国，在属国这一点上渤、新所处地位差不多。正因为渤、新的属国地位差不多，才会发生渤海与新罗国的所谓“争长事件”。但是，渤、新所处地位又不同，渤海是唐帝国的一个州（忽汗州），新罗却不是。因此，渤、新在对外政策方面受唐的制约程度有区别，同新罗比较，渤海受制约程度大一些。

有的外国学者，例如原苏联、今俄罗斯的沙夫库诺夫先生认为：渤海国从它“存在的第一天起就是一个独立的主权国家。历代国王都实行独立自主的对外对内政策”<sup>⑭</sup>。这种观点，这个结论，不仅与中国史籍记载不符，且与日本史籍记载不符。如前所述，渤海国充其量是一个“国中之国”，实际上是一个“国中之州”，若果真如沙夫库诺夫先生所说，渤

海国是一个“独立的主权国家”，那渤海国王何必接受唐朝皇帝册封而称臣（属国的郡王、国王在中国皇帝面前也是“臣”）呢？以此类推，渤海国既然不是一个独立国家，哪来的“独立自主的对外对内政策”呢？只能说，渤海国的对外政策有较大的独立自主性。这个问题之所以必须澄清，是因为渤海国不是一个独立国家。同时，这个问题涉及到一系列问题，例如：8—10世纪的中、日关系问题等。

在世界历史上没有多少国家的历史象渤海国历史这样，同时受到几个国家史学家的高度重视，有的将其视为自己“祖国历史”的一部分<sup>①</sup>。究其原因固然很多，渤海国的二重性看来是原因之一。只看渤海国的对外政策有较大的独立性，不看渤海国是唐帝国的属国（也是属州）这种附属性，就容易把渤海国看作“独立国家”。反之，只看渤海国是唐帝国的属国，不看渤海国有较大的外交独立性，就不易理解渤海对日本外交诸问题。

笔者近几年有机会同一些日本学者<sup>②</sup>以及其它国家的学者探讨有关渤海国问题。仅就渤、日外交史看，尚有一些问题须进一步研究、讨论。本文所涉及的问题只是其中的一小部分。

注：

① 长期以来，中、外史学家一般持：727年渤海向日本首先派遣使臣的观点。例如日本的石井正敏先生等。见石井先生《渤海在日唐帝国的中介作用》一文。载《黑龙江文物丛刊》1983年第11期。

孙玉良先生认为：渤、日两国友好往来，实际上是日本在先，渤海在后。720年正月，日本“遣渡岛津轻津司从七位上诸君鞍男等6人于~~新罗~~国，观其风俗”，是为两国友好交往之滥觞。见孙先生《日本古籍中的渤海史料》一文，载《学习与探索》1982年第4期。

② 中、日某些学者将原渤海国遗臣、东丹国遣日使臣裴寥第三次出使日本作为渤、日外交之继续。

③ 参阅注①石井先生同名论文。

④ 《绥化师专学报》（社会科学版），1989年第4期。

⑤ 张高：《渤海国家的形成问题》，《辽金契丹女真史研究》1988年第2期；

张高：《论渤海国的社会性质》，《辽金契丹女真史研究》1989年第2期。

⑥ ⑩ 《续日本纪》卷10。

⑦ 《续日本纪》卷18。

⑧ 时为858年。

⑨ 《新唐书·渤海传》。

⑪ 《渤海简史》第155页。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

⑫ 金毓黻：《渤海国老长编》卷10。

⑬ 〔日〕浜田耕策：《唐代渤海与新罗的争长事件》，《龙江史苑》1985年第2期。

⑭ 见沙夫库诺夫先生《渤海国及其在滨海边区的文化遗存》一书。此书中文本译者是林树山先生。

⑮ 朝鲜及韩国一些史学家的观点。

⑯ 例如：铃木靖民教授等。

⑰ 例如：美国的简慕善教授；德国的优翰先生；韩国的任世权教授、韩圭哲博士；朝鲜的张国权教授等。

（责任编辑、校对马依弘）